

戴忠沛

关键词:西夏文 藏文 注音

作者戴忠沛,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荣誉助理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香港薄扶林道。

聂历山很早就意识到这些残片里的藏文注音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笔迹,^③但他却没有将不同来源的藏文注音分类处理,也没有说明每一个藏文注音分别出自哪一份残片,令人不无遗憾。可以推想,不同的笔迹乃出自不同的书写人之手,当他们各自用藏文为西夏字注音时,会

③ 参见 N. A.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Si- 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 前言部分。

受到个人的藏文拼写习惯、藏语口音差异,以及对西夏语音的听感知的影响,彼此的注音风格肯定会有差异。如果将出自不同人手笔的注音混杂在一起,互相干扰,就很难看出藏文注音规律所在。在这方面,汉语学界处理汉藏对音的经验,可堪借鉴,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①里就将不同佛经来源的汉藏对音残片分开处理,结果不但使藏文注音的对音规律呈现出来,还透过比较不同类别残片中反映的汉语语音特征,推测出各类残片写成年代先后。前人的经验当予我们启示。笔者认为,过去夏藏对音资料所呈现的一些混乱现象,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将不同来源的残片分类处理所致。因此,在使用藏文注音的材料之前,如何提炼、校勘这些材料,减少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将讨论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分类问题,考证各类残片的来源,并指出不同类别残片之间存在表音差异。

一、目前所见残片

目前虽然已知有 30 份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但直至现在学界尚未有对所有 30 份残片进行彻底整理。目前可见残片数量最多的相关整理,见于戴忠沛的博士论文《西夏文佛经残片的藏文对音研究》。^②该论文共收集了 20 份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顺序编号为残片 1 至残片 20。这些残片分别循三个途径收集得来:

1. 残片 1 至 16 出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原件照片的复印本现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尚未出版刊布。这批残片无边框格线,西夏字俱为手写,行数不一,按格式可再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残片 1、2、3、4、13、14 和 15,内容都是一种七言偈文;第二类包括残片 5、6、7、8、9、10、11、12 和 16,内容是一种长篇仪轨,行 23 至 25 字。据伊凤阁 1923 年的介绍,^③这批残片是科特维奇从一个书套中拆出的。

2. 残片 17 及残片 18 出自英藏黑水城文献,照片均已刊布。其中残片 17 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 Or12380 (1842),亦即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发表的 K. K. II. 0234. k,^④已刊布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 2 册,^⑤原件乃斯坦因于黑水城遗址地表挖得。残片 18 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 Or12380(3495),已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内刊布。^⑥这份残片也是由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地表挖得,是一种九言佛偈,残片有边框,藏文注音以无头字手写体用较浅的颜色(估计是朱笔)注在西夏文右边。

3. 残片 19 和残片 20 乃从其他出版刊物补入。残片 19 在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一文中作为附图刊出。^⑦文章没有介绍图内残片的来历、编号和尺寸。该残片共 6 行,行 24 至 25 字,残片格式和西夏文字迹与上述俄藏长篇文体类的残片完全一样,周边有装裱的痕迹。

①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 年。

② 戴忠沛:《西夏文佛经残片的藏文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 年。

③ 参见伊凤阁:《西夏国书说》,《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4 号,1923 年,第 675-686 页。

④ 参见 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r 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Vol. 3, Plate CXXXIV。

⑤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册,第 224 页。

⑥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第 198 页。

⑦ 参见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沈卫荣等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6-446 页。

二、残片的分类

既然 C 类笔迹由残片 11 开始,那么残片 7 在原文献所处的位置当在残片 11 之后。C 类笔迹的西夏文与 B 类一样,但藏文笔迹则与 B 类明显不同,比较瘦弱乏力。

D 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 17 一份,由斯坦因从黑水城地表挖得,不论西夏文还是藏文笔迹均与 B 类十分相似,但由于出处不同,暂时单独算作一类。

E 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 18 一份,由斯坦因从黑水城地表挖得,残片有边框,内文是一种九言佛偈,与其他残片不同,故此单独算作一类。

F 类笔迹:此类笔迹只有残片 20 一份,由克恰诺夫从俄藏文献里找得,内文经荒川慎太郎查得是译自汉文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夏字为刻版,藏文注音以朱笔注在西夏字的左边,与其他残片不同,单独算作一类。

至于目前未见的 10 份残片,其中 7 份属俄藏文献,估计都是由科特维奇由书套拆得,应不离 A、B、C 三类笔迹。另外 3 份属英藏文献,出处和内容未明,可能与以上分类都不相同。

三、残片内容出处

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的内文出处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虽然除了残片 20 外,其他残片的内文来源都尚未清楚,但透过解读还是能发现若干线索,或许有助未来找出答案。

A 类笔迹的残片是一种七言佛偈,其中包括了“相胜母”、“实来”等译词,应译自藏文佛经。在残片 3 里有一句“三面八手三目妙”,尤其引人注目。查藏传佛教里有三面、八手、三目的,很可能是指摩利支天母。A 类笔迹残片还提及了箭、罽索等,也与摩利支天母手持弓、箭、罽索等形象相吻合。汉文大藏经里与摩利支天母有关的佛经有《大摩里支菩萨经》、《摩利支天经》、《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及《末利支提华鬘经》,但都找不到与残片内容相符的经文。藏文大藏经有三部与摩利支天母有关的佛经,分别是德格版 564 号、北京版 182 号的 vPhags pa vod zer can zhes bya bavi gzung(意译为“圣摩利支天陀罗尼”);德格版 565 号、北京版 183 号的 Sgyu mavi vod zer can vbyung bavi rgyud las phyung bavi rtog pavi rgyal po shes bya ba(意译为“幻化摩利支天出现本续中所出细轨王”);德格版 566 号、北京版 184 号的 vPhags ma vod zer can gyi dkyil vkhor gyi cho ga vod zer can vbyung bavi rgyud stong phrag bcu gnyis pa las phung bavi rtog pavi snying po bdun brgya pa shes bya ba(意译为:“圣摩利支天曼陀罗仪轨、摩利支天出现本续一万二千颂中所出细轨藏七百颂”),^①虽然藏文广略三种本都相当于汉文的七卷本《大摩里支菩萨经》,但藏文本或许收有一些汉文本所缺的部分,可与 A 类笔迹残片的佛偈勘同。

B 类和 C 类笔迹的残片明显是一种佛教仪轨,估计也是译自藏文佛经。残片 7 提及“阿利”和“迦利”两个词语,聂历山认为这是出自某种佛教声明学的作品。^②米勒曾指出在藏传佛教金刚乘的成就法鬘的真言(S dhanam l mantra)里经常出现这两个词语,^③未来可循这方

① 参见大谷大学图书馆:《西藏大藏经甘殊尔勘同目录》,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1930-1932 年,第 76-78 页;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0、130-131 页。

② 参见 N. A.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

③ 参见 R. A. Miller,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li, K li as grammatical terms in Tibe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6, 1966, pp. 125-147。

向作深入考据。另外,残片里经常提及“金刚”、“瑜祇母”,并有一次提到“猪头”,可能是一种与“瑜祇母”或“亥母”有关的佛经。

D 类笔迹的残片 17 提及“金刚瑜祇母”,可能与 B 类和 C 类字迹的残片相关连。残片里提及“要语”,可能是一种“要门”。^① 该残片中第 13 和 14 行之间有三个从背面透墨的西夏字,可惜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最后, E 类笔迹的残片 18 在左上方有几个藏文词,转写为“...se vdzwar vjo nye”,意思不明,或可为考证残片出处提供线索。

四、残片书写年代和人物

残片的书写年代和人物,关乎残片内藏文注音反映西夏语音的时代和地点,也关乎藏文注音以何种藏语方言为根据。藏文注音的书写人是藏人还是西夏人,他们是否兼通西夏语,都会影响他们笔下的藏文注音风格,有必要作考证。

在书写年代方面,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虽然都出自黑水城,但至今学界对于黑水城文献的来历,到底是黑水城本地的,还是外地带进来的,存有不同意见。俄藏文献绝大多数来自黑水城的一座佛塔,而其中的文献多数是 12 世纪的作品。由此猜测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也在该时期写成并不为过。A 类、B 类和 C 类笔迹的残片都是由科特维奇拆自书套,如果能知道那本书的资料,查明那本书的刊行或装订年代,自然就能知道这批残片大致的书写年代。可是至今一直未见有文章提及残片是由哪一本书的书套拆出的,如果能翻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记录,或许能查出一些线索。

至于书写人的身份,从残片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在 A、B、C 类笔迹的残片里,都能找到藏文注音颠倒的例子,即前一个藏文注音实际所注的是后一个西夏字,而后一个藏文注音倒是注前一个西夏字。另外还能找到藏文注音初时错注下一个西夏字的读音后来再补注,甚至多个西夏字的藏文注音连续错位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书写藏文注音的人很可能不懂得西夏字,只是凭听到字音在相应的方块字旁边以藏文注音。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书写西夏文的人和作藏文注音的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 B 类和 C 类笔迹的残片里的西夏文字迹一致,中途的藏文字迹却有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猜想,既然作藏文注音的人不懂西夏字却懂得藏文,他很可能不是西夏当地人,而是从藏族地区赴西夏的藏族僧人。

从藏文注音表音功能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得知至少 B 类、C 类和 D 类笔迹的藏文注音都能区分声调,反映注音的人本身的口语应该是一种有声调区别的藏语方言。现时藏语三大方言里,安多方言至今没有声调,因此这三类笔迹的书写人应该不是来自安多地区。现今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都有声调,其中卫藏方言的原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已经清化,是送气音,而康方言保持清浊对立,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不送气。西夏文残片内藏文注音的基字清浊对立,浊塞音及浊塞擦音都不送气,从这些情况看,似乎较接近现代藏语的康方言,但目前卫藏方言部分地方也具有这些语音特征,不能完全排除注音人来自卫藏地区的可能。^②

透过不同笔迹的比较,还可以发现 B、C、D 三类笔迹的注音风格比较接近,而 A 类笔迹与

① 蒙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老师指出,特此鸣谢。

② 蒙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老师指出,特此鸣谢。

另外三类笔迹的风格差异较大。在所有笔迹的类别中,下加字 w 基本只在 A 类笔迹才出现,似乎下加字 w 在 A 类笔迹注音人的口中还是发音的,而在 B、C、D 三类笔迹的注音人口中则不发音,由此猜想 A 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可能与 B、C、D 三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有较大的差别。由于 A 类笔迹的残片与 B 类、C 类笔迹的残片都是拆自书套,估计这三种笔迹的残片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A 类笔迹注音人与 B 类、C 类笔迹注音人的口语差别应该是共时的方音差别,而不是历时的语音演变。

五、不同笔迹藏文注音表音功能的差异

如果将西夏文残片的藏文注音按照藏文基字、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和元音符号排列,与所注西夏字的声韵系属,以及对应的汉字注音及梵文对音作系统性的比较,并将藏文注音按不同的笔迹分别排列,可发现不同笔迹的藏文注音风格并不一致,兹举数例说明:

1. 藏文的下加字 w,在西夏文残片藏文注音的 A 类笔迹里还保留得颇为完好,而在 B 类、C 类等其他笔迹里,则几乎完全消失。在现代绝大多数藏语方言里,下加字 w 都不具备任何表音功能,它的表音性质在什么时候消失,及消失的过程如何,目前学界所知有限。夏藏对音残片里的藏文注音,说明当时 A 类笔迹的书写人的认知里,下加字 w 还是表音的,而在 B 类、C 类等其他笔迹里,下加字 w 的表音功能已经不存在,为下加字 w 消失的过程提供了证据。

2. 在 B、C、D 三类笔迹里,前加字 g 或 d 与鼻音基字相拼时能改变音节的调类,使之与西夏语的平声相对应。在 A 类笔迹没有这种现象。这说明 B、C、D 三类笔迹书写人的藏语口语里,已经存在声调,而 A 类笔迹书写人的藏语口语可能并没有声调区分。

3. 在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基字前, A 类笔迹基本只能带前加字 v; B 类笔迹能带前加字 v、g、d,或上加字 r,也可以不带任何加字; C 类笔迹和 D 类笔迹都是前加字 v 与前加字 g 或 d 杂用,其中 C 类笔迹较倾向使用前加字 g 或 d,而 D 类笔迹较倾向使用前加字 v。由此可见,在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基字前的前加字使用是具有规律的,而不是随意或杂乱无章。这一点对于判断西夏语是否有前置鼻音尤其重要,因为过去否定西夏语有前置鼻音的论据,正是指相应的藏文注音前加字使用混乱,从而认为这些前加字并不表音。当我们将藏文注音按笔迹分类,即可发现前人所指的混乱,其实是各种笔迹的藏文注音相混而造成的。

概括而言,各笔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加字的选用方面。相对来说,基字的选用和反映的音值在各笔迹都比较一致。这反映了西夏文残片内藏文注音的两个层次:当注音人凭现成的藏文拼写组合已经能为他们听到西夏字作注音时,各笔迹的注音人基本上都会遵从现成的藏文拼写法。但当他们听到的西夏字音比较奇怪,例如是一些藏语没有的西夏语声母,未能用现成的藏文拼写记录,那么他们就得各自想办法把这种语音描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藏文拼写的先例可循,各人之间的方法会有差异,但每个人使用的方法内部却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笔迹藏文注音的异同大抵由此而来。

〔责任编辑 华祖根〕

Categories and Origins of Tangut Fragment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

..... **Tai Chung-pui**(58)

Abstract: Thirty fragments of the Tangut manuscripts have their phonological transcription in Tibetan script currently. It has been known earlier that thes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had at least 3 different kinds of handwriting. However, the different handwritings have never been categorized. As a result thos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from different origins interweave together, interfering the analysis of Tangut phonology. Using the most updated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tegorization of different handwritings among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 It gives a brief examin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se fragments, and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mong various handwriting categories.

Keywords: Tangut; Tibetan; transcription.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Author of AsaraYci's History

..... **Uyunbilig Borjigidai**(64)

Abstract: According to Mongol and Manchus archives of the Inner Secretary Office and Cabinet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ame the author of AsaraYci's History and his first half of life. Through the record of the history book,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ast judgments about the goal of the history book and the author's tendency are not correct. The paper also corrects some errors in the archives.

Keywords: AsaraYci's; Itegelt nayirtu erke dayicing; Qing, the Dynasty.

The Xi (僬) as An Ethnic Group in the Southwest Yis (西南夷) : Also

Discussing the Migration of the Shu (蜀) People toward the South

and the Fusion of the Shu and Southwest Yis by Shi Jinbo **Shi Shuo**(72)

Abstract: The Xi is one of the nine Southwest Yis peoples or tribes in the Account about the Southwest Yis of the Shi Ji by Sima Qian.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trib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ord " 僬 " was a symbol for the ancestral legend and tribal memories of the Shu people. The region where the Xi people lived coincided with the area of the migration Shu people. So, the Xi was the Shu who migrated to the south and their descendan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Xi was lack because the Han court wanted to hide the fact that the Shu was still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Yis.

Keywords: Xi; Shu people; Southwest Yi.